

09



第十三辑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松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松江文史

第十三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松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三月



陈之平于1960年3月在济南为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所摄的合影。



胡厥文同志与画家陆俨少在上海静安宾馆
畅叙乡谊。
张祖麟摄



廖家初烈士遗像



惠民中学三烈士任阳升、金开礼、浦海林遗像

目 录

- 毛泽东主席批示推广松江县首届首次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 陈昌言 (1)
松江医疗预防机构的首创 王宾如 (4)
《顾绣》新生述略 梁景惠 (9)
解放初期松江群众文化工作中的几则轶事 郁羽祥 (13)
一次难忘的演出 徐林祥 (15)
- 松江沦陷的前前后后 吴仲炳 (18)
沈千祥烈士遇害经过 江根泉 (25)
魔窟——汪伪松江特工站 江根泉 (27)
- 朱舜水与松江 方 行 (30)
三公街之“三公” 谭俊升 (34)
董其昌与顾绣 孙佩芸 (37)
松江博物馆董其昌书画藏品简介 姚建平 (42)
李中梓与《内经知要》 刘克定 (47)
云间朱孔阳 郑逸梅 (48)
- “无松不成报”与松江的报纸 顾伟民 (50)
“步公纪念厅”的来历 许约瑟 沈士衡 (56)
马路桥之兴废及变化 杨秉文 (58)

- 松江奇石与碑刻 韩夫荣 (60)
松江地名小识 唐舜华 (64)
浅谈旧时民间敬神活动及其表演形式 徐树清 (67)
火烧邱家湾天主堂 范奕中 (73)
云间掌故琐谈 金石声 (76)
陆机的“灵犬”黄耳 王健民 (78)
绫锦墩——九亭境内的重要遗址 曹云岐 (80)
客寓偶抄 张兰森 (83)

毛泽东主席批示推广

松江县首届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陈 昌 言

(一)

松江于1949年5月13日解放后，分别成立了松江市和松江县人民政府。8月初，市、县合并为松江县。县人民政府在上级领导下，经过积极筹备，于194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召开了松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松江历史上一次空前的人民民主盛会，各界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全县大事。在华东新解放区这也是第一个全县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松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各区、各镇、各业、各界代表286人（男261人、女25人），其中职工代表35人，农民代表138人，青年及学生代表13人，教育界代表22人，自由职业代表15人，妇女界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30人，开明士绅代表11人，党政军代表19人。主要议程是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和讨论今后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第一天上午，陆恂如县长报告筹备经过和通过了会议主席团名单后，接着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作报告。他讲了三个问题：

(1) 关于新解放区农村减租减息问题。建议按华东局公布的减租减息暂行条例执行，按原租额减低25%至30%，除地租外任何变相剥削和陋规均应取消和禁止。(2) 关于对工商业的政策问题。阐明除了对投机奸商和违反政府法令的行为依法取缔外，坚决采取保护政策。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3) 关于合理负担问题。为了保障前方供给和后方各种经费，在农村中暂时采取征收公粮制度，在城镇中整理各种税收。並讲了当年秋征暂按“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的原则，以户口赋元采取按户累进征收办法。还要发动群众清查黑田，开展反地主恶霸转嫁负担的斗争。第一天下午的会议，中共松江县委书记余克作了《松江县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报告。松江县县长陆恂如作了《关于松江县四个月施政工作》报告。陆恂如县长就解放后的接管、支援前线、生产救灾、剿匪肃特、巩固治安、夏季征粮等工作列举各项数据作了详尽说明。会议的第二、三天各界代表分组讨论，共分为10个组。计职工代表1个组，农民代表每区1组共6个组、青年代表1个组，自由职业代表1个组、工商业及士绅1个组。详细讨论了大会的三个报告和几个文件草案：《华东新区农村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草案)》，《苏南行署关于征收公粮公草修正办法(草案)》，《上海市军管会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在讨论中，代表们情绪热烈，均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讨论结果，大家对三个报告和几个条例一致拥护，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意见。会议的第四、五天进入大会发言，代表们争相报名，先后有42人在大会发言，如工农代表沈一青、汤仁贵、刘秀生，工商界代表陈姜

琏、王隆藩，士绅代表朱叔建、吴伯扬，文教界代表沈天默、沈雨若，自由职业代表张致果，妇女代表姜兆麟，青年代表张榴桃、徐瑞应，宗教代表赵宗福等。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有关决议，有《松江县1949年征收公粮公草实施补充办法修正草案》，《松江县减租减息补充办法》，决定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会议闭会期间组成驻会委员会，并设立“生产救灾”、“文化教育”、“复工复产与劳资关系”、“税务整理”等研究委员会，在驻会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决定把代表提案165件交有关部门处理并负责答复。会议最后由县委书记余克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

（二）

松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10月4日闭幕后，《解放日报》于6日发表了饶漱石讲话全文，13日发了会议报道和县委书记余克关于松江县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报告摘要，并发表题为《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的社论。10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将会议要点电告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主席阅后，于10月13日亲自草拟《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于当日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你们看了松江县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新华社于14日发了关于江苏省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消息。16日又发了题为《学习松江的榜样，普遍召开市、县人民代表会议》的社论。指出：“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是地方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这就是今

天联系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最好的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这对于完成人民解放战争，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各地当前工作中的困难和缺点，都有伟大的作用”。“我们认为每个市或县都应当学习松江和其他许多城市的经验，迅速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离今已经41年了，人民民主已有了很大发展。但今日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加强与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人民政权，仍是有所教益。

松江医疗预防机构的首创

王 宾 如

松江第一所医院——湘宗医院

解放前，松江的医院极少。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曾先后设立湘宗医院（1921——1929年）、若瑟医院（1923——1953年）、松江医院（1927——1937年）、崇华产科医院（1928——1935年）、茸城医院（1930——1952年）、德琼医院（1930——1953年）、松江公医院（1946——1949年）、松江县卫生院（1947——1949年）。在此以前，松江也曾有过一些临时性的医院。如在1915年、1919年、1921年霍乱流行期间，由松江士绅、工商界先后发起筹办的时疫医院、松江临时救疫医院等。从这段历史看，湘宗医院应是松江最早创建的一所私立医院。

湘宗医院是焦湘宗医师创业开办的。他是山东省即墨县人，1916年于国立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宝隆医院工作。1919年松江地区流行霍乱时，由松江的绅、商两界郑于松、张省三、周鹤云等发起筹办临时行病医院，邀请焦湘宗莅松施诊。他有良好的医术、医德，热心为病家服务，从此誉满茸城。1921年，焦湘宗在松江西门外长桥堍建造一座二层楼的楼房作为院址，创建了湘宗医院。该院设五张病床，门诊治疗内、外、妇科。当时松江西医极少，焦湘宗积累临床经验，精心为病员治疗，深受病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称颂。至1929年，焦湘宗接受青岛医院之聘，离开松江，并将湘宗医院作价转给柯德琼医师。柯于1929年接办湘宗医院后，改名为德琼医院。

松江第一所防痨机构——松江县结核病防治所

在旧社会，我县肺痨病较多，死亡率很高，有“十痨九死”之称。

解放后，柯德琼医师鉴于肺结核病对人民的危害，于1953年毅然将毕生创建的德琼医院全部院产捐献给国家，作为开展防痨工作的基地。经中国防痨协会和国家卫生部的同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于1953年9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防痨协会松江分会，将德琼医院改组为松江县结核病防治所。中国防痨协会松江分会第一届理事会有27人，候补理事4人，副县长姚鹤雏为理事长，柯德琼、曹德箴为副理事长，柯德琼还被聘为总干事，并担任结核病防治所所长。

松江防痨机构成立后，积极为松江专区各县举办卡介苗接种训练班（预防肺结核病），推动防痨事业的开展。松江县结核病防治所设门诊、住院部，病床30张；医疗设备有一架20毫安X光机和化验室；工作人员34人。在各级政府和县卫

生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逐步形成了县、社（乡）、队（村）结核病防治网。县结核病防治所于1981年12月1日改为松江县结核病防治院（在松江镇乐都路新建院址2500平方米）；全县20个乡镇卫生院均有肺科医生；全县308个生产大队（村）卫生室均有一名乡村医生兼管结防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开展群防群治。对新生儿和7足岁、13足岁的学生，全面进行接种卡介苗，预防肺结核；对患有肺结核病人全面普查普治。经过30多年的努力，取得显著效果，全县肺结核患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下降。1953年松江镇地区的机关、学校开展健康检查时，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占50%，至1975年全县普查肺结核病时，患病人数4766人，患病率占10.87%，1986年全县患病人数减少到322人，患病率又继续下降到0.63%。肺结核病死亡率，1975年下降为22.8／10万，1986年又下降到6.81／10万；该病死亡平均年龄：1975年为60.5岁；1986年为67.24岁。

松江第一所预防机构——松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站

血吸虫病在我县流行时间较长，危害很大，俗称“肚饱病”、“水鼓胀”。解放前，我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地区造成“村庄毁灭，人死户绝，田园荒芜，一片凄凉”。

解放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防治血吸虫病，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松江专区成立血吸虫防治所，我县于1951年6月成立松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站（解放初，县政府设在泗泾镇，血防站设在泗泾镇中市桥堍；1952年1月迁至松江城区白龙潭；1957年迁至松江镇人民路74号）。由县长李少峰兼站长，松江专区医院院长曹德箴兼副站长，顾达珍任政治指导员并主持日常工作。建站时人员来源于松江专区第一届医师进修班、苏南卫生学校、无锡

防训班、松江专区化验训练班共44人，1952年增加到75人。该站成立后，首先组织血防干部下乡、下基层，依靠各级党政领导，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干部群众对血吸虫病危害性的认识，破除“肚饱病系命里注定，风水勿好”等迷信思想；第二，培训医务人员，组织力量抢治病人。1951年下半年先在泗泾、亭林二地接受新兵治疗，在枫泾菖梧乡开展农村血吸虫病治疗试点工作，当年三处共治疗578人，初步掌握了治疗经验；1952年初，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师生、华东、苏南医疗队以及本县社会开业医生等400余人的密切配合下，在枫泾、亭林、泗泾、城东等区分设37个治疗组，集中治疗1233人，无一人死亡。1953年利用农闲季节，在枫泾、亭林、泗泾、天昆等区建立委托组，县血防站进行巡回技术指导、集中治疗1185人。1954年后，全面执行“边宣传、边化验、边体检，边治疗”的查治方法，开展大规模的防治工作。第三，开展调查研究，确定流行范围。从1955年9月到1956年7月，全县进行全面查螺，划分血吸虫流行地区及非流行地区，确定5个区、43个乡和2个县属镇为流行区（不含1956年10月划归金山县的枫泾、亭林2个镇、以及枫围、亭新等5个公社。）1979年行政区划变更，全县流行地区确定为松江镇、泗泾镇、华阳桥、车墩、新桥、九亭、泗联、余山、天马、五里塘、洞泾、张泽公社。这些流行地区的历年有螺总面积为18050400平方米；历年查出血吸虫病共计68334人，晚期血吸虫病共计4931人。

1956年为加强血防工作领导，成立中共松江县血防领导小组，县委第二书记张寿任组长，县长戴根渠任副组长，卫生科长陈志英兼血防办公室主任。流行区的各乡镇也相应建立了血防领导小组，深入开展血防群众运动。县血防站人员

全力以赴，深入农村组织培训293名公社、大队血防干部和1千多名生产队灭螺员，坚持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相结合，采取灭螺、治疗、粪管的综合防治措施，经过30多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在1984年全县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全县历年共治疗血吸虫病212939人次（人均治疗3次），晚期病人切除脾脏3326人。对保障人民健康和挽救生命取得巨大成绩。

松江第一所妇幼保健机构——松江县妇幼保健所

解放前，本县农村妇女普遍由旧产婆接生，对妇婴健康受到损害，死亡率很高。

解放后，1951年2月成立松江县妇幼保健所（所址：开办时与县卫生院联合办公，1953年迁至长桥南诸行街，1957年迁至马路桥南人民路74号，1984年迁至乐都路37号），负责全县妇幼保健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第一任所长由松江专区医院妇产科主任夏瑞英兼任，副所长由该所助产士伊亚伦担任，开办时工作人员3人，以后增加到11人。

县妇幼保健所成立后，在50年代重点改造、取缔旧产婆、各乡村培训一名接生员，大力推广新法接生。1958年8月起，全县成立乡医院（后改卫生院），由助产士负责产前检查和接生，大队接生员负责产后访视和接生工作。1979年起实行分级培训和管理，县妇幼保健所负责各公社（镇）卫生院妇保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各公社（镇）卫生院负责女乡村医生培训和业务指导，进一步加强了孕产妇保健和婴幼儿系统管理。这时，随着全县住院分娩率的提高，女乡村医生重点做好产前、产后访视；卫生院妇幼保健医生重点开展孕妇围产期保健和儿保门诊；1985年县妇幼保健所开设儿保门诊，为系统观察儿童生长和疾病进行矫治。

县妇幼保健所的建立和全县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的发展，有效地保护了广大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县中心医院、泗泾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和部分卫生院的产科质量不断提高，全县孕产妇死亡率由1949年的32／万逐年下降到1986年没有发生；新生儿死亡率由1951年34.9%逐年下降到1986年12.5%；对严重影响妇女健康的子宫脱垂和尿瘘两种疾病，通过全面调查摸底，从1977年起对340多名患者分批送到县中心医院和上海瑞金医院进行免费手术治疗；对全县已婚妇女，由各乡镇卫生院开展妇女病普查普治；对0—6岁儿童，从1979年起，每年由各乡（镇）卫生院进行健康检查，查出小儿营养不良、佝偻病、缺铁性贫血，立即矫治。

《顾绣》新生述略

梁景惠

明代名闻遐迩的顾绣，“七·七事变”后渐趋湮没，几乎被人们所遗忘。到七十年代，又付奇般地重新出现，轰动全社会。但对于顾绣重新问世的整个过程却鲜为人知，现就此作一简略的叙述。

顾绣出自露香园，露香园原址在现在老城隍庙附近的露香街道一带。在明代，这个地区属于上海县县城，而上海县属于松江府管辖，因此顾绣与松江结下了不解之缘。露香园主人顾名世、顾寿潜祖孙倡导书画绣不遗余力而举世瞩目。

园内女眷们仿历代名人书画绣成的绣品被称为“露香园顾绣”（以下简称“顾绣”），对后世刺绣艺术影响甚大。三十年代，上海通志馆副馆长徐蔚南先生在《顾绣考》中记载：“顾绣之专称，代替刺绣之通名江南至今如此也。”直到现在，北京、香港等地还有“顾绣庄”存在，尽管这种“顾绣庄”不过以“顾绣”两字为标榜，但有力地证实了徐先生的著名论断，亦可管窥顾绣对刺绣艺术影响之一斑。

抗战前，松江“松筠女子职业学校”是“全节堂”创办的一所以学习刺绣为主的综合性职业学校。到芦沟桥事变后停办，时间虽然不长，但确实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刺绣技术人才，为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母亲曾就读于“松筠”，她能画能绣，经常在工作之余绣制一些枕套、拖鞋、寿帽、寿鞋等绣品。我从小爱好美术，时而也帮母亲描描花样。她见我对美术和刺绣艺术颇感兴趣，便常常向我忆述她在“松筠”学习时的一段经历，她说：“学生们除了学习文化课之外，在老师的指导下，主要学习绘画和刺绣技艺，大多数绣品有题款、有印章，绣得象图画一样……”。这种绣品当时称为仿真绣、画绣、松绣。都是顾绣的继承和发展。

我除了爱好国画与刺绣艺术外，对书法、篆刻、古典文学、诗词、地方掌故乃至鉴赏都具有浓厚的兴趣。但从小的耳濡目染，特别是母亲“绣得象国画一样”这句话，深深印入脑海。及长，在工作学习之余便注意收集与顾绣有关的资料，对顾绣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渐渐产生了恢复顾绣生产的愿望。

1972年，初创的工艺品厂刚从阔街搬迁到邱家湾。当时我在从事捏绣枕套的纹样更新设计工作。同年秋天，松江手工业局负责行政业务的第二召集人吕子正同志到我厂，向部分同

志传达他在北京参观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的盛况和周恩来总理关于发展传统工艺美术产品的指示。这次小型会议我也参加了。虽然会议时间不长，但如醍醐灌顶，对我启发很大。它使我油然想到明代这颗工艺美术的熠熠明星——顾绣。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向当时的工艺品厂党支部书记徐则圆同志介绍了“顾绣”，并向他谈了恢复顾绣生产的设想。徐则圆同志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不久，厂方即向松江手工业局等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书面报告，要求恢复顾绣生产。在市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胡铁生同志的热情支持下，报告获准。厂部立即行动起来，由支部委员黄宝如同志分管，我负责设计顾绣稿子和参与恢复顾绣生产的其他具体工作。

1972年年底，有关部门分配一批应届毕业生充实工艺品厂的职工队伍。与此同时，根据我和孟福英等老同志的提名，厂方以3个月为期，到期续订合同的形式，向社会招聘了擅长刺绣的张文兰，顾子贻等师傅（戴明教在1974年春亦以合同进厂），让老绣工对部分新进厂的青工，进行刺绣技术的辅导。从基本功训练开始，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我也设计了一些顾绣画稿，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好景不长，到1974年上半年，正当新老绣工进入绣制顾绣作品的尝试阶段时，一场“反对右倾翻案风”政治风暴席卷全国，顾绣生产在“复辟”、“复古”等罪名下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老绣工大部分回家，留下的被分配到本厂各个车间。我仍旧设计我的枕套纹样，顾绣生产的恢复工作被迫停止。我设计的《仿宋人红蓼水禽图》、《红叶绣羽图》等几幅顾绣作品尚未完工，就被送进了仓库。

顾绣生产的恢复工作虽然中止，但我对它的信心仍旧没有动摇。我坚信象顾绣这样的民族文化瑰宝是不可能被长期